

论维新派教育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丁平一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维新派教育思想是以变法维新为目的,以西政思想为指导,以教育改革为手段,企望通过大量吸收新学来达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局部改良。他们的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越了封建传统教育思想的藩篱,但却未能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未能达到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成熟水平。总观其教育思想,虽仅仅反映了一个短暂历史时期脉搏的跳动,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依然格外引人注目。

关键词: 维新派、教育、改革

维新派所处的时代,正是甲午惨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瓜分之祸迫在眉睫的时代。维新志士谭嗣同大声疾呼:“外患深矣,海军燬矣,要害扼矣,堂奥入矣,利权夺矣,财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谭嗣同:《仁学》)如何拯救濒临危亡的中华民族?维新派认为只有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扫除几千年来在国人头脑里形成的“君主至上”的封建伦理纲常思想,变封建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而要扫除思想上的障碍就需要以“开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则首先有赖于教育,为此,维新派一方面将教育的作用空前地高扬,将其视为变法救亡之本;另一方面,对传统的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猛烈批判。这种高扬与批判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充分表现出维新派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首先,维新派认为教育兴则国兴,教育衰则国亡,他们将教育的兴衰与国家的兴亡、与变法的成败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康有为作《大同书》,在他理想的“大同”社会里,教育占极重要地位。他说:“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康有为:《大同书》)他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乃是教育不良,民智未开,因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而“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器械,而在穷理劝学。”(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梁启超则认为变法之成败皆系乎教育,只有首重开民智,培养变法人材,变法才有成功之望:“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开民智的途径如何?他说:“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而且,他看到“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因此“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人,他也如康梁一样,认为发展教育开通民智是变法之急务。他说:“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深浅成正比……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他的结

论是“教育强国根本。”（《学衡》第7期）维新志士谭嗣同也认为：“天下大计，经纬万端，机牙百启，欲讲富强以刷国耻，则莫要于储才；欲崇道义以正人心，则莫先于立学。”因此：“故论变法必先从士始，从士始必先变科举……大变科举而后可造就人才，而后可变一切法。”（谭嗣同：《上欧阳瓣菴师书》）

从维新派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想以教育为重要手段，以此更好地达到变法目的。为此，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革，如兴学堂、创学会、办报社等，使教育从传统的单纯的学校教育扩展为广泛的社会教育。据梁启超的不完全统计，1897到1898年三年中全国设立的著名学会、学堂、报馆共51所，实际上，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如后来有人统计，全国8个省在1895至1898年创办的报刊就约30余种，后来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也曾说：“一年间，设会百数。”学堂、学会、报馆三者好比：“一一佛化千百身，一一身具百千口，一一口出百千言。”（谭嗣同：《湘报后序》）学堂培养人才，学会广开风气，报纸则将学堂之所教，学会之所陈，传于全省并灌溉他省，使一切新学新政皆弥纶贯舞于三者之间。维新运动之所以能在顽固势力还很猖獗的时候开展得有声有色，使变法思想如潮如涌，这与维新派对教育作用的深刻认识分不开。

在高扬教育作用的同时，维新派对封建的八股取士制度也进行了猛烈批判，批判的彻底、尖锐也为历代对八股取士制多有微辞的士人所不及。

清代以来，一直沿袭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康熙年间，虽曾一度停止过八股取士而改试策论，然策论试行未久又复旧制。至晚清，士习日漓，文体日敝，试场献艺，考生都循题敷衍，谄陋空疏者有之，滥竽充数者有之，营私舞弊者亦有之，哪怕是素有优良教育方法、私办的地方主要教育机构——书院，也随着书院官学化的不断加强而完全沦为科举的附庸，它同样也逃脱不了衰败的命运。如当时维新人士熊希龄等人曾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揭露书院种种弊端，如指出山长不通时务，互相排挤，经年屡月不到院，且许多还品行不端，前庭歌童，后庭女乐，院规不整，学风败坏，许多生徒到院课读亦只是想混点膏火银。熊希龄等人指陈的这些情况实际上已是全国所有书院的普遍现象。

康有为弟子徐勤揭露八股取士竟导致“考官阅卷，以贞观为西京年号，佛寺为西土经文，甚至有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为何人，曾入翰林，而问司马迁为何科前辈者”（徐勤：《中国除害论》）的可悲景象。更有甚者，则是八股取士制对国家的遗害，对人智的戕贼。严复将废八股提到了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他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而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他还沉痛地指出：“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严复：《救亡决论》）康有为则认为：“辽台之割，铁路、矿务、商务之输与人，国之弱、民之贫，皆由八股害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故他在《请废八股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力主废科举，他说：“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储才。得才之路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谭嗣同称八股为“坑儒之坑。”（《谭嗣同全集》第405页）唐才常更是以切肤之痛控诉了八股对自己的毒害：“唐才常椎心泣血，大索塞智摧权腐心之鸩毒于国中而不得，遂反而求之吾身。因忆吾未冠以前，低首摧眉，钻研故纸，瞑坐枯索，抗为孤诣秘理，沾沾自足，绝不知人世间复有天日，复有诟耻之事……其沈冥惨酷已若斯之烈，则其他之营营帖括，沁人肝脾，终其身不知反者，其如何晦盲堙圯，更无言以状之。悲夫！吾中国之塞智摧权腐心亡种亡教以有今日

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唐才常：《时文流毒中国论》）

维新派对封建教育的批判在士人和社会上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当时，虽有些洋务派头面人物也看到了八股取士的弊端，但却怕犯众忌而触众怒，不敢大胆批判，维新派勇敢地站出来，与延续了数百年的科举制作斗争，这在当时顽固势力还占统治地位的时候确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的批判无疑促进了维新时期期的教育改革，也无疑给衰落的教育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二

如上所述，八股取士制何以会导致如此严重的恶果呢？教育宗旨的谬陋是最主要原因。八股取士，实则是“八股优则仕”，凡课举业的士子必须为学好八股文而学、而思。因为，只有课好八股才能“入仕”，“入仕”是士子为学的目的，课八股是入仕的手段，晚清的教育已完全沦为科举的附庸，哪谈得上什么救国强国的教育！

维新派一改往日封建教育宗旨，他们在教育的目的和指导思想上都不同程度地冲破了封建主义的束缚，但他们由于时代和思想的局限，又免不了留下“放大的小脚”的残迹。

首先，在教育的目的上，维新派所要达到的是救国强国的教育。如支持维新运动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中开篇便道：“照得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中日议和以来，内外臣工，仰体时艰，深维图治之本，莫不以添设学堂为急务。”这其中便将开办学堂的目的讲得很明白，即：为“国势”、“时艰”、“图治”而立。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的“立志”一章中也将教育目的讲得很清楚。他说学生为学首当“思国何以蹙，种何以弱，教何以微。”在“读书”一章中也道：“今时局变异，外侮交迫，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可见，维新派办教育的目的高出以“入仕”为目的的旧式教育许多，而且，也高于洋务派以地主阶级“自救”为目的而兴办的教育。洋务派是在完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从地主阶级“自救”目的出发来办洋务教育的；而维新派则企望通过资产阶级参政来改变、限制和削弱数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表现在政治上是实行君主立宪制，但他们却又并未达到要完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高度，反映在他们的教育目的上即是救国的国家主义教育，而并不是从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出发，从而达到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启蒙教育。也正因为维新派最重视的是对封建政体进行局部改良，因而在文化教育上，便表现为以本位文化为立足点。本位文化发生了问题，需要吸收外来文化补充，即所谓“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梁启超：《新民说·释新民之义》）这便是维新人士对其所提倡的新学教育的注释。也说明他们对近代新学的吸收仅停留在“取其所长，补其所短”的水平上。

由此，反映在维新派的教育指导思想上，一方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又在思想深层保留了“中体西用”的痕迹。

维新派教育指导思想是以其“西政思想”为基础的。所谓西政思想即指以学习西方政治为主的思想，“西政思想”反映在他们教育思想上便产生了“西政教育思想”，在教学中他们特别注重“西政教育”，梁启超将维新派的西政教育思想表述得十分明确，他说：“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故为今日计，莫若用政治学院之意，以提倡天下。”（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他认为洋务教育失败是因其“言艺之事多，言政之事少。”他的结论是：“今日为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

学为附庸……今日中国不思自强则已，苟犹思之，其必兴政学始。”（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维新派的“以政学为主义”的“西政”教育思想与洋务派“中体西用”教育指导思想有很大的区别，这成为其教育思想最重要的特点。当时，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从维护晚清腐朽的封建统治出发，兴办了一些洋务教育，如开设西语文学校和船政、武备学校，他们对教育内容作了些微调整，洋务教育的成效是非常有限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洋务派完全恪守了“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为本，以西方科学技术为用”的“中体西用”原则，始终认为向西方学习只能限于船炮器械，而决不能学西方的政教文化。如曾国藩、李鸿章合奏的选派幼童赴美所定章程中便归定学童到美国后，除学西艺外，还必须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而且“每遇房、虚、昴、星等日”，还要“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洋务运动》第二册，第158页）清末洋务派教育活动家张之洞则从理论上总结了“中体西用”教育思想：“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谙其知识，练其技能。”（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张之洞的《劝学篇》对“中体西用”思想更是作了高度概括：“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对洋务派的教育指导思想，维新派一针见血地提出了批评：“谨按自甲午以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法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之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还指出：“三十年来，曾国藩、文祥、沈葆楨、李鸿章、张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不见李鸿章训练海军之洋操，所设之水师学堂、医学堂乎？不见张之洞所设之实学馆、自强学堂、铁政局、自强军乎？李以三十年所变者若此，张以十五年所变者若此，然则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张者出其温和之手段以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梁启超：《政变原因回答客难》）由此也可见，维新派对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教育指导思想是很不以为然的。

然而，维新派自身又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纲常名教的阴影，在他们的教育思想中不时闪现着“中体西用”思想的痕迹。如康有为替山东监察御史宋伯鲁代拟的奏折中便有言道：“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94页）梁启超在他代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也说：“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谭嗣同、唐才常对西学采取的也是“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必以中学为根本”（《时务报》第四十三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的原则，这些论调确实与洋务派又有某些相似之处。为什么维新派在西政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实行的教育改革也还是不能完全脱出洋务派的窠臼呢？原因很明显，这与维新人士自幼至长都是受的封建的伦理纲常传统教育有关。康有为幼年就“曾受过严格的程朱教育。”（梁启超：《“万木草堂”回忆》）康之高足梁启超也如其师一样，哪怕是维新运动的激进份子谭嗣同，也同样不能完全摆脱封建伦常思想的影响，他自己便是以清王朝的一名官吏身份参加变法的，因受到皇帝垂青而忠心耿耿为皇帝效力，甚至还曾天真地希望凭圣明的皇帝几道白纸黑字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面貌，封建伦常思想在他身上同样有所体现。正因为维新派也未冲破封建伦常思想的束缚，他们最终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对者。封建伦常名教思想经过它的维护者们两千多年来潜移默化的教育，已浸入中国封建知识份子骨髓里，流淌到他们的血液中，使他们与封建伦常思想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维新派所处的时代是充满矛盾的时代，当时，在封建的

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中国知识份子必须重新选择,建立他们的教育价值观,在中西文化的交融过程中,维新派对传统的封建教育价值观发起了攻击,西方优越于清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引起了维新思想家的无限向往,在这一点上,他们比起死命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洋务派确实先进多了。但是,他们肩上的历史因袭又太重,使他们最终还是受到了封建强力的干扰,康、梁、严等人晚年的倒退便是最好的明证。

正因为维新派在教育指导思想上一方面以西政教育思想为指导,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挣脱“中体西用”的束缚,因此,他们的教育思想最终还是没有冲破封建的伦理价值观,他们的教育最终还是停留在“西政教育”阶段,而且,未深入到广大下层群众心里,仅停留在部分中上层阶级的心理改变上,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的一段话可说是道出了维新派西政教育思想的严重缺陷,他说:“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益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立宪政治而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曰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因为维新派所向往的是君主立宪政治,故他们在教育内容上并未从思想文化入手进行彻底的启蒙教育,启蒙教育的重任最终落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肩上,这便造成了维新派教育思想的根本局限。

三

教育宗旨的变化必然带来教育内容的变化。维新派在教育内容的改革上一方面是十分注重政学教育,一方面是注重中西并重的教育,然而他们教育改革的步履十分艰难,引起了顽固派的疯狂攻击和极大恐慌。

首先,在教育内容上维新派贯彻了其“以政学为主义”的西政教育指导思想。这种教育与传统的以传授封建伦理道德为主体、以培养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人材为目标的旧式教育有着重要的区别,它注重宣传变易、改制思想,借“孔子改制”思想和“公羊三世说”来抨击暴虐“不仁”的封建专制主义,这种教育内容的安排旨在培养变法维新人材。如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就经常向学生灌输变易进化思想。他从自然界生物的进化说到人类社会“三世”、“三统”的递变。他将“今文经学”的“三世说”的历史观与《礼记·礼运篇》中的“小康”和“大同”思想揉合起来,向学生宣传民权平等和历史进化的政治学说。不过他讲学中虽形式上标榜公羊三世说,实质上则结合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模式,改造了公羊学完全没有质变的三世循环论,提出了新的进化论思想,为培养变法维新人才作准备。康讲“学术源流”这一教学中心内容时,也是按自己的政治改良观点去评价过去的学术思想流派的。如他既充分肯定孔孟儒学中的“仁政”思想,又否定批判程朱新儒学,矛头常直指封建专制主义,讲学中的臧否、取舍十分明显,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梁启超后来回忆他就学万木草堂时所受教育曰:“居一年,乃闻所谓《大同书》者,喜欲狂,锐意谋宣传,有为谓非其时,但不能禁也……后此万木草堂学生多言大同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也如康有为一样,在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亦亟重政治教育。他根据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把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一为“多君为政之世”(据乱世)二为“一君为政之世”(升平世),三为“民为政之世”(太平世)。梁启超以“三世说”为理论武器,批判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而发挥了其资产阶级民权平等学说,为变法维新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时务学堂在制定课程时,就以“政学

为主义”，其“课程以孟子、公羊为主，兼亦宣讲孔子改制之说”，目的是“旨在为中国改良政治创造条件。”（唐才质：《湖南时务学堂略志》）梁启超还通过批改学生札记进行政治宣传，他说：“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梁启超：《时务堂课艺残卷》序）时务学堂其他维新派教习，如唐才常、谭嗣同、韩文举（康有为弟子）、叶觉迈（亦康有为弟子）等人讲学时都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之政治论。”（唐才质：《湖南时务学堂略志》）

维新派“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使教育的社会功能明显地体现出来了，从维新派开始，教育机构逐渐成为政治活动的舞台，是维新教育家揭开了近代教育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而且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材也大多热忱政治运动。如万木草堂学生徐勤就始终跟随康有为搞政治运动，万木草堂学生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人都致力于维新运动。时务学堂学生也有许多从政者，梁启超曾回忆说：“予在时务学堂虽仅半年，所得高材生甚多。自我亡命赴日，一班四十人中有十一人随我俱去。后唐先生才常在汉口实行革命，十一人中死难八人！”（梁启超：《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讲演》）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也道：“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有为的青年。唐才常汉口一役，时务学堂之死难者颇不乏人。”如时务学生蔡锷、林圭、田邦旋、易鼎，李炳环、蔡钟浩等人都成为自立军起义和辛亥革命的中坚份子，之所以出了这么多热衷政治运动的人材与维新派“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内容改革是分不开的。

其次，维新派在教育内容的改革上还特别强调“中西并重”的教育。中西并重，即指既学中学，又学西学，这也是维新派教育思想区别于洋务派以及古代教育的重要一点。

维新派之前的洋务派曾推行过西学教育，但他们推行的西学教育是十分有限的，仅限于西语、西艺教育，因此，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中西并重”的教育原则并未在中国教育界确立，直到维新运动期间，中西并重的教育才由维新教育思想家正式提出。当时，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就正式规定、学生既学孔学、佛学、又学泰西哲学；既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又学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既学中国词章，又学外国语言文学；梁启超后来回忆说，在万木草堂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有关声、光、化、电等西译书，当时万木草堂的学生都认为：欲要自立，就要多读西书，多学自然科学。维新运动期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维新派努力争取才得以成立的，当时“康有为上书请变法，遂及学校，梁启超为侍郎李端棻草奏，请立大学堂于京师。”（罗惇齋：《京师大学堂成立记》）在《京师大学堂条规》中规定：“中西学分途考试等第，各分高下”，又规定：“中学西学，每日各以二时上堂学习。”可见京师大学堂教学上也是采取的中西并重的原则。而时务学堂则正式在《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大概章程》中明确提出了“学生所学，中西并重”的原则。“中西并重”的教育原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首创，它为后来旧式学校向新式学校过渡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如光绪29年（1903），长沙岳麓书院改湖南高等学堂，课程就“以研求中西学为主旨”。可以说，直到维新运动时期，中国二千多年教育只重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和排斥外来文化的局面才有所转变。

因为维新派在教学内容上作了上述的改革，故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极大恐慌，他们疯狂攻击：“康之弟子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易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还攻击道：“戴德成、樊锥、唐才常、易鼎（都是维新运动骨干份子）承其（指梁启超）流风，肆行狂

煽，直欲死中国之人心，翻亘古之学案。上至衡、永，下至岳、常，邪说侵淫，观听迷惑，不解熊（熊希龄）、谭（谭嗣同）、戴、樊、唐、易诸人是何肺腑，必欲倾我邦家也。”（苏舆：《翼教丛编》卷五）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在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1899年1月30日）上奏中竟攻击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乃逞其笔舌，乘间而兴。附会公羊，则为孔子改制之文，以遂其变法行私之举。民权平等，邪论蜂兴，狂恣之极，遂成悖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505页）更有甚者是他们还要求清廷派军队，“随时随地，明查暗访，如有私肆西学谬称讲求时务者，立即严拿。”（《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83—485页）面对顽固派的疯狂进攻，熊希龄等维新派人士也写了有名的《上陈中丞书》（注：陈中丞指陈宝箴），书曰：“龄观日本变法，新旧相攻，至于杀人流血……不如是，则世界终无震动之一日。”可见，维新派与顽固派在教育领域里的斗争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一斗争虽发生在教育领域，实则却是新旧两种势力进行政治较量、新旧两种思想争夺阵地的一个侧影，从中也可以看出封建主义土壤的深厚和教育改革步履的艰难。

（上接第103页）

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由此可知，诸子十家学派，渊源于礼制的不同官职。而六经皆礼，因而十家学派亦渊源六经也。所以《汉书·艺文志》曰：“今异教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也。

既然，诸家学术源于礼，而礼又渊源者何？谭戒甫《墨辩发微·名墨参同第五》篇云：“尝考吾华夏邃古之文化，殆以礼事为最先，皇侃曰：‘礼事起于燧皇’。燧皇者，燧人氏也，始兴火化，故孔子曰：‘礼之初始诸饮食’。饮食出于田功，故伊耆氏以食老物，岁终献功，祀于明堂。”谭氏所言甚确。燧人氏发明了火，使生食变成熟食，而生食是由于农夫田间劳动创造的，因此，在岁终为感恩天地雨露，于明堂设礼祭祀。同时让农夫万物得以休养生息。显而易见，礼渊源于劳动生产实践。所以孔子又说过，闰月不告朔，非礼也。他的学生“子贡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这就是让人们通过告朔之礼不要忘记生产季节，同时又籍告朔之礼，报本反始于天地。孔子之论，亦证明礼渊源于生产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一切文化渊源于劳动实践，是科学的历史唯物观。我国历代各派学说源于礼，而礼又源于生产实践。我们应为此感到无限骄傲。因为她丰富、验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

为何评价、用什么方法评价历来不同学派，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代学者对不同流派都有评价，但都因出自政治和学术上的原因，评价不甚准确，也不全面。实践证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逻辑等科学理论，才能对不同学派的历史背景、源流、体系、是非得失等多方面深入地研究，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等专著，各是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评价，很有参考价值。然而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准确地评价历代不同学派，得力之作是不很多的。学报学是学术研究刊物，还其不同学派的庐山真面目，赋予其一定的历史地位，负有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①②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页

④《列宁选集》第347—348页

⑤⑥《毛泽东选集》第499页，第667—368页